

【民俗文化与社会】

城市化与中小商人的“文化人”角色

——以“北京成文厚”个案为例

董晓萍 [法]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

内容提要:在有关中国中小商人社会史研究中,对其成为城市人过程中“文化人”角色的作用进行探讨是有必要的。中小商人资金不多,商业发展空间不足,在企业管理与家族生活兼顾的背景下,商业运营规模与家族生活水平的相关性就显露了出来。他们的文化代表性正体现在他们的各种专业知识结构,对各个方向的市场信息报告的判断和采纳中,以及在解决各种传统家庭危机的过程中,取得平衡点。在我们实际上不大可能了解商号运作实际过程的情况下,了解商人的精神世界和家庭生活史,就成为我们考察的一个途径。在北京成文厚的个案中,中小商人充分承担了“文化人”的角色。他们为了家族利益和商业组织的共同目标,往往怀有极大的责任感、企业归属感和忠诚品质。他们生活在北京这座中外商贸和地方商业活跃交流的城市中,熟悉传统又创新求变,在抓住某些商机的情况下,同样可以度过战争、社会和家族危机,获得较大发展的可能性。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还注意近年国内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对城市个案研究的重构作用。

关键词:中小商人的社会史;城市档案;商人生活史

近三年来,我们合作发表了一些文章,讨论城市进程中的民族资本家的精神遗产。^①我们认为,城市政府与商人的关系具有某种重要性。在某些关键时期,商人的商业活动对城市政府及其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商人和政府管理有不同的目标,但也有共同的利益,这使他们在某些条件下具有结盟的可能性。在民国至新中国初期史上,一批民族资本家活跃在北京、上海和重庆等大城市,他们往往有农村移民背景,又在城市获得了商业成功;他们不仅是资本家和懂专业技术的管理者,还是具有儒家思想教养的家长。他们带领商号在城市社会的环境中和现代商业竞争中拼搏,同时还要承担管理家庭股份、照顾其他家族成员的家庭经济和培养家族子女的责任,成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角色。但以往学者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我们认为,研究中小商人成为城市人的过程,是不能不关注这种“文化人”的角色的,因为中小商人的卓越管理能力是与他们的文化代表性紧密关联的。重视“文化人”的角色和功能,有助于较为深入地讨论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作者简介:董晓萍,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期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民俗学、商业民俗志、跨文化的比较民俗学;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宋史和中国地方社会史。自1997年起两教授合作至今,陆续完成华北民间水治与基层社会史、清代至民国时期地方商业社会史等合作项目,已出版著作《不灌而治》(中华书局,2003)和《中国近现代行业文化研——技艺和专业知识的传承与功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等。

所谓中小商人“文化人”角色,主要是指反映在中小商人群体中一种比较独特的商业文化特性。这种文化特性在其经营过程中往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强烈的责任感、企业归属感和忠诚品质,既熟悉传统又创新求变,并善于捕捉商机,从而在经营中能够避开或化解来自社会的或家族的危机,实现家族利益和商业组织的共同目标。我们在以往研究中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中小商人自身的精神世界与奋斗历程,而这正是研究中小商人的“文化人”角色的关键。中小商人的资金不多,商业发展空间不足,在企业管理与家族生活兼顾的背景下,商业运营规模与家族生活水平的相关性就显露出来了。他们怎样在家族与商业的谋生关系中扩大城市市场?他们在传承行业知识时需要哪些必要的社会条件?他们在什么样的资本积累条件下可以投资新技术?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他们的文化代表性也往往体现为他们在利用各种专业知识、各个方向的市场信息报告和解决各种传统家庭危机的过程中,能每每根据市场行情、不同行业资源组合的需求、家庭股份的利益,投放经济投资和人际关系成本,找到解决问题的平衡点。

北京成文厚,全称“北京成文厚账簿文具店”。商号的创业经理刘国樑,山东籍北京商人,私塾毕业,1935年到北京开商号获得成功。在民国时期北京被日军侵占的艰难岁月中,他继承家族商业传统,经营纸张文具;同时吸收现代商业组织理念,将家族传统与当时的先进外来会计知识相结合,创建了北京现代会计账簿企业,并在十年内迅速发展,占领了国内北方账簿市场。北京成文厚与美国哈佛大学会计专业毕业的潘序伦及其执掌的上海立信会计用品公司南、北鼎立,在商界享有“南有立信、北有成文厚”的盛誉。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主要利用北京城市档案,辅以口述史调查,开展综合研究。在我们实际上不大可能了解商号运作实际过程的情况下,了解商人的生活史,并从这个角度开展对城市档案的研究,就成为我们考察的一个途径。

本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利用成文厚的城市档案和商人活动,二是成文厚的家族生活和商业组织的城市社会化的关系。这是我们研究工作的两把钥匙,缺一不可。

一、成文厚的城市档案和商人活动

成文厚的城市档案有四种,即工商档案、户口档案、企业档案和会计学校教育档案。我们在2011年的两篇文章中,主要从商人的商业组织理念和股份制经营的角度对此做了讨论,包括成文厚的业务范围、营业执照、经理简历、合伙契约、股份利润和铺保网络。但当时没有讨论商人的生活史与商业组织管理的关联性。近两年,我们在这方面增加了田野调查,发现在城市档案中,有以下方面,在缺少商人生活史资料的情况下,是无法正确解读的。

第一,档案中所没有登记的重要家族成员姓名共计2人。他们是经理刘国樑在吉林成文厚的二弟刘国英和刘国樑本人的妻子王桂荣。在1951年父亲刘显卿过世后,刘国樑将母亲李绍棠登记为房地产权人,升任到兼管家族和商号的首脑位置。其妻王桂荣操持所有家族生活和商号福利管理杂物,刘国樑却没有登记妻子的名字。

第二,档案所没有登记的家族谱系关系。成文厚的家族辈份和伦理秩序,我们只有依靠刘国樑的儿子刘基厚兄弟的口述才能识别。例如,吉林成文厚经理刘国英,20世纪40年代初被日本宪兵杀害,其子刘敦厚由徒弟侯兆祥带到北京成文厚,后由刘国樑抚养成人。刘国樑的三弟过世后,三弟媳携子刘享厚,也投奔到刘国樑家,依靠家族股份生活。对刘敦厚和刘享厚的继股身份和吃股方式,是从档案中完全看不出来的。

第三,档案所未登记的家族股份制变更与商人在变更中谋求发展的矛盾。

刘国樑的幼弟刘秉揽,英国留学军官。1952年公私合营开始后,他与刘国樑的长子刘基厚共同放弃股份,由刘国樑吸股,并转而扩大企业投资。

经核对,所有城市档案的登记是准确的,但档案与商人生活口述史的功能不同。借助商人生活的口述史再看档案,可以补充此前阅读档案存在的遗漏,发现曾被我们忽略的商人活动的历史线索。兹简要讲两点。

(一)城市档案中的家族商号与公会

据北京城市档案,北京于1913年成立纸张文具同业公会^②。刘国樑于1935年到北京后加入该会,取得行业认同资格。但直至1955年,他并没有将公会变成家族同行谋福利的组织。对于年长自己四岁而做工不好的堂兄刘干亭,他始终没有合作。刘国樑时任同业工会副主席,与堂兄在同业公会中分别登记各自的商号。但刘国樑对自己聪明能干的长子刘基厚不同,刘基厚已于1951年离开北京上大学并于1952年退股,但在1953年的一份登记表中,刘国樑却将儿子写为股东,仍对儿子当商人抱有希望(表1和表2)。

表1 北京市档案馆1953年同业公会档案^③

字号	股东姓名	经理				独合资	资金
		姓名	性别	年龄	籍贯		
成信	刘干亭	刘干亭	男	48	山东	合	50,000,000
成文厚	刘基厚	刘国樑	男	44	山东招远	合	300,000,000

表2 北京市档案馆1955年同业公会档案^④

企业名称	经理姓名	地址	资本额	独合资	从业人数	
成文厚	刘国樑	西单北大街139	35560000	合伙	合计	其中职工
					16人	15人

刘国樑是通过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下属西城区缸瓦市基督教堂进入北京账簿市场的。在这个宗教组织中,他结识了教友、北京会计贾得泉,两人合作制作会计账簿;结识了教友、春合体育用品商店经理、北京商人傅怡斋,两人结成铺保和资本运营的伙伴;结识了缸瓦市基督教堂的石云浦牧师,并通过北京基督教的关系扩大了市场客户网络(表3)。

表3 成文厚商号与基督教“会”的合作网络^⑤

教“会”主要关系网络	地址	时段	资料来源
刘国樑与教友开会地点	西单大街小将坊胡同大院	1945-1956	刘兴厚口述
教友、铺保傅怡斋春合体育用品商店	西单北大街137号	1953-1957	梁吉照口述
教友、铺保永和寿材厂会计张官鼎	西单大街大将坊胡同2号	1952-1956	1954-1955年永和寿材厂档案
教友、贾得泉簿记学校	西单北大街45号	1942-1956	刘兴厚口述
缸瓦市教堂与石云浦牧师住所	西四砖塔胡同36号 ^⑥	1940-1957	刘基厚口述

在“表3”中,成文厚商号与基督教“会”建立了合作网络,这个网络是要依靠户口档案、工商档案、教育档案和口述史四者恢复的。例如,第6行“缸瓦市教堂与石云浦牧师住所”,这里利用北平市警察局保存的1948年缸瓦市教堂户口档案和刘基厚口述史,恢复这座教堂与成文厚和刘国樑经商的关系。将刘国樑对同业公“会”和基督教“会”的态度对比可见,基督教会是他带领成文厚进入城市社会的主渠道。他曾担任缸瓦市教堂的执事,从成文厚商号中提取资金资助教会活动。他虔诚地维护宗教信仰,并带着这种信仰进

入城市商业组织。

(二)商人生活与商号经营中的房产

经调查商人生活的口述史,再看城市档案,可以发现,刘国樑十年商业经营的重要活动之一,是购买和使用属于家族生活与商号店铺共享空间的房产。他在不违反家族伦理原则的前提下,在不属于家族股份经营的范围内,灵活使用北京中小商号“前店后厂”的传统,逐步分离、购进、出租和回收房产,有条不紊地利用流动资产,扩充商号规模(表4)。

表4 刘国樑经营成文厚房产的商业活动一览表^⑦

房产活动分类	住宅与商号	地址	时段	资料来源
刘显卿时期:前店后厂	注册经理刘显卿的成文厚商号/刘国樑家族的老宅	西单北大街134号	1935-1946	1949年成文厚档案/刘基厚兄弟口述史/刘兴厚指认与项目组GPS定位
刘国樑在接父亲进京(1942)之前将个人住房与店铺分离	商号:原址 住宅:个人购房	西单北大街5号	1940	1940年北京警察局档案 [®]
刘国樑时期(将商号与家族住宅分离后)	商号:原址 住宅:家族搬迁	西单北大街134号/西单大将坊胡同甲2至5号	1948-1956	1948年刘国樑户口档案/1954-1955年永和寿材厂档案和刘基厚兄弟口述/本项目组GPS定位
	回收大将房2号的刘秉揽房产、出租给永和寿材厂	西单大街大将房胡同2号	1952-1956	1954-1955年永和寿材厂档案/刘基厚夫妇口述史/本项目组GPS定位
刘国樑时期(公私合营前后)	公私合营前的成文厚扩大商号房产之一:合并赵子安茶叶铺	西单北大街137号(购买教友赵子安店铺房产/合并成文厚原址)	1951	梁吉照口述/刘兴厚指认后本项目组GPS定位
	公私合营后的成文厚扩大商号规模之二:合并春合铺保	西单北大街139号(购买春雷电讯房产/合并入成文厚)	1952-1954	1948春合体育用品商店档案/1951-1952成文厚档案/梁吉照口述/本项目组GPS定位
	扩大商号规模之三:吸收久大铺保	西单第三商场15号/与成文厚商号靠近	1952-1954	1952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档案/梁吉照口述/本项目组GPS定位
	吸收久大分支店	西单北131号	1954	1954久大档案/梁吉照口述/刘兴厚指认后,本项目组GPS定位
	吸收久大体育用品制造厂	西单北安里9号	1954	1954久大档案/梁吉照口述/刘兴厚指认后,本项目组GPS定位
	扩大商号规模之四:合并西单文化体育用品商店	徐瑞芝成文厚书店旧址	1952	梁吉照口述/刘兴厚指认后本项目组GPS定位
	扩大商号规模之五:购买旧宅熟人房产,建成文厚库房1	西单北大街4号,刘国樑个人旧宅邻居,用作成文厚库房	1952-1978	梁吉照口述/刘兴厚指认后本项目组GPS定位
	扩大商号规模之六:购回个人旧宅,建成文厚分店2	西单北大街5号,刘国樑1940年个人旧宅,老同兴百货店	1952左右-1970	梁吉照口述/刘兴厚指认后本项目组GPS定位
	扩大商号规模之七:建成文厚分店3	西西北大街45号,1951-1955年贾得泉簿记学校地址,后并为丹明庆南纸文具店		1938-1956贾得泉档案 [®] /梁吉照口述/刘兴厚指认后本项目组GPS定位
	扩大商号规模之七:投资荣华印刷厂	前门西河沿205号	1949-1953	1952-1953年荣华装订印刷所支所档案
	扩大商号规模之八:龙门装订厂	前门和右安门	1956-2007	北京第一制本厂汤培仁口述
扩大商号规模之八:宏大印刷厂	白塔寺锦什坊街	1949-1956	梁吉照口述	

如果我们仅仅根据档案和口述,是看不出刘国樑经营房产的思路和做法的。档案只能提供地址和房

地产权人。我们还要做田野调查,搜集口述史,才能明白这些地名的意义。分析表四4的资料,可以较为全面地观察刘国樑经营房产的商业活动。

第一,在父亲刘显卿任经理期间,他买下西单大街134号,采用前店后厂的经营方式。在1940年,他将个人家庭住所迁至西单北大街5号,但商号仍在134号。他遵循中小商号的前厂后店的传统,将家族房产与商号房产合一。

第二,1946年,他将厂店分离,购进大将房胡同2至5号,共计4套房,分别给兄弟4人居住。1951年,其父刘显卿过世,他将家族全部房产权转至母亲名下。

第三,在他成为名副其实的实权经理后,1951-1952年,他购进西单大街的下列房产:赵子安茶叶店137号、春雷电讯商店138号、春合铺保139号、西单文化体育用品,西单北大街5号(刘国樑原住宅)、贾得泉会计学校45号,并运作久大铺保的房产靠近自己的商号。

第四,1952-1955年,他回收幼弟刘秉揽、子刘基厚、侄刘敦厚三人的股份。他又将刘秉揽放弃的大将坊胡同2号房产出租给教友永和铺保。他在家族内吸股和吸金,双向运作,然后用所得资金投资前门荣华印刷所。

刘国樑经营房产的关键,是对北京商号“前店后厂”老传统的不同处理。在父亲刘显卿掌管时期,他遵循“前店后厂”传统。这是家族企业经营管理的标准模式,北京人也叫“连家铺”,其目标是增加固定资产。在刘国樑个人掌管时期,他打破传统,搞厂店分离,在风险环境中,通过扩大流动资产的方式谋求发展。仅1951年至1954年三年间,他新建库房和商号分店5处,利用家族内部的双向吸金投资印刷厂1处。他为家族获利和企业发展充满了奋斗的动力。

二、成文厚的家族生活和商人的城市社会化

我们在2011年的文章中提到,北京成文厚家族18口人,6个男性有股份,9个女性无股份。少数人的股份要承担家族生活和子女教育的庞大开支,以及商号投资和企业管理,所以家族开支与商号资金是一对突出的矛盾。刘国樑做到了将家族管理与商号发展的协调运作,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

(一) 勤俭奋斗的家族生活

城市中小商人的资本积累是十分辛苦的。刘国樑的长子刘基厚说,“什么叫‘家族企业’?家族企业就是家族成员都得帮忙”。刘国樑和父亲刘显卿都吃住在店里,很少回家。刘显卿就死在店里。刘国樑的生活极为简朴,不抽烟、不喝酒。家里没有儿童玩具,没有任何家庭成员使用的奢侈品。家人和徒弟的衣服鞋袜全靠自己缝制。

刘国樑视徒弟如家人。他给徒弟侯兆祥娶亲,买了西服领带,在北京著名大饭店“同春合”办婚礼,还让儿子刘基厚夫妇当伴郎和伴娘。平时每月还为职工提供洗理费、伙食费,为职工提供进会计学校的学费,乃至医药费。他对这些支付都毫不吝啬,处理家族关系和企业劳资关系并重。这在北京中小商号中是极为少见的。

他的山东商业家族在北京的亲属很多,其中有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另外三位长辈:大爷、十七爷、十八爷以及他们在北京的后代。十七爷是天津著名商号鸵鸟墨水公司的经理,家住北京,他的儿子就是前面提到的做工不好的刘干亭,刘国樑的堂兄。刘国樑对这些家族房支也礼尚往来,但由于家族股份利益的限制

和商号资本积累的艰难程度,他对其他房支却付出的很少。他能把自己的企业福利做得很好,却无法彻底解决所有家族福利问题。

(二)以现代教育促进商业组织的城市社会化

刘国樑积极投资家族现代教育,他相信西方科学知识,承担了幼弟刘秉揽赴英国留学的全部生活费。他的家庭中充满了基督教教育的气氛,母亲和妻子每天读《圣经》,子女随父亲去教堂和参加教友读书会。他的长子刘基厚和长媳关毓顺都在北京最有名的教会小学和中学毕业,三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三个女儿也分别毕业于清华附中等名校,全部子女都受到最好的学校教育。刘国樑也从未放弃商业家族的传统教育,他教儿子和孙子打算盘,写毛笔字,掌握经营账簿业的真本事。他强调会计学的专业教育,送儿子和徒弟去贾得泉簿记学校学习。这个家族和成文厚商号通过现代教育的途径进入了北京的城市社会。

结 语

民国中期至新中国初期,在社会环境动荡和社会体制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民族资本家及其家庭怎样成为“城市人”?这是他们承担“文化人”的角色的前提。通过北京成文厚的个案,我们可以总结以下几点。

“文化人”的角色含义及其代表性。在民族资本家的商业理性中,有一种始终不肯放弃的“文化人”角色及其行为之道。他们为了家族利益和商业组织的共同目标,往往怀有极大的责任感、企业归属感和忠诚品质。他们生活在北京这座中外商贸和地方商业活跃交流的城市中,熟悉传统又创新求变,在抓住某些商机的情况下,同样可以度过战争、社会变迁和家族危机的难关,获得较大发展的可能性。

商号与会。北京成文厚商号通过加入城市同业公会,取得了城市行业阶层认同的资格。但是,实际上帮助商号经理取得商业成功的是城市基督教会。这个中小商号主要依靠基督教会的关系带来的流动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取得了成功。这时商人付出的最高代价,是在获得了超越家族关系的社会关系后,却没有在家族同行关系中承担“会”的福利职能。

中小商人的勤奋精神。在北京成文厚的个案中,勤奋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忠诚的家族归属感;二是商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商业活动中去,做到人商合一;三是节省生活开支,投入商号运作。勤奋的回报是中小商号不依赖国家社会福利解决家族谋生和企业发展的成就感,但这在转为现代新型大工业时,又有先天的脆弱性。

现代教育对于成为城市人的作用。北京成文厚的经理刘国樑重视现代教育,包括欧美学校教育、会计专业教育和基督教生活观的教育。他还继承了传统商业家庭的教育,即精通珠算和写一手好毛笔字,并将之留传下去。他要求子孙都要会打算盘和都要写好中国字,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使他的全家成为出色的“北京人”和北京“文化人”。

注释:

① 关于作者研究城市化与民族资本家精神遗产的主要论文,参见董晓萍、[法]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现代商业的社会史研究:北京成文厚(1942—1952)》,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2);[法]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董晓萍:《北京成文厚个案研究——撰写北京商业史的资料、方法与初步结果》,[法]蓝克利主编:《中国近现代行业文化研究:技艺和行业知识的传承与功能》,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第319—347页。

② 北京市档案馆:《中华民国二年一月七日纸行并立商会杂志》,档号:087-019-00001,题名:《历史沿革、公会章程及委员名册》,档案时间:民国二年(1913)十二月初一。

③ 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同业工会档案087-019-00044同业工会文具》,全宗号87,目录号19(文化用品商业),商号笔划会员名册(1-9区),档案时间:1953-01-01-1953-12-31。

④⑤ 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同业工会档案087-019-00066同业工会文具》,全宗号87,目录号19(文化用品商业),商号笔划会员名册(1-9区),档案时间:1955-01-01-1955-12-31。

⑥ 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内二分局缸瓦市大街户口调查表》,档号:J181-006-00788-001,目录号:001-150。户口房号:1-77号。其中招远原籍8户,基督教信徒39户,天主教信徒2户,耶稣信徒1户。

⑦ 2009年1月21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2006级博士生吕红峰随刘兴厚夫妇对刘国樑老宅进行了实地GPS测量,并撰写了调查报告初稿。吕红峰还曾参与我们对大、小酱坊胡同空间的两次调查,北京籍并家住西单大街的博士生赵娜也参与了胡同走访,谨此一并说明并致谢。

⑧ 北京市档案馆:《北平市警察局关于刘国樑等人请领旅行证仰详查填覆的训令》,档号:J1-3-2-25297,档案时间:1940。

⑨ 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警察局内三区署关于徐星武挑担涉及违禁书籍的案的呈》,档号:J181-23-4482,档案时间:1938。另有贾得泉会计学校教育档案8种,详见董晓萍《贾得泉簿记学校档案报告》,2007-09-16,打印稿。

Urbanization and the “Cultural Role” of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men: A Case Study of Chengwenhou, Beijing

Dong Xiaoping, Christian Lamouroux

Abstract: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urban commerce ha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ental world and curriculum of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men whose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business perspectives were limited. In so doing, the scale of their activities, crucial for any city, are linked to their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and their familial way of life. How could they use such links to expand their urban professional network? If this expansion was grounded on new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what were the social conditions which made this transfer of knowledge simply possible? What was the financial basis of their investments in new technology? Given the difficulty to get detailed data regarding the concrete management within a small firm, the present study on Beijing Chengwenhou associates the manager's life story with the urban archives related to his firm. Obviously, this cas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business orientation of the Beijing Chengwenhou manager was two-fold: he tried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his family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his firm. In the process, he always kept in mind the sense of his familial and moral duties and his responsibility towards his firm. The members of Chengwenhou family were living in Beijing, a city where Chinese and foreign firms coexisted and local trade activities and vigorous exchanges could be developed. Practicing business traditions but always in search of modernization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e family could survive the war and various social and familial crises by developing the Chengwenhou firm. In the general context of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 the Chengwenhou case shows how important it is to discover and reconstruct different case studies.

Key words: Social history of small and medium firms; urban archives; life story of businessman

(责任编辑: 奕平清)